



# 中国民族性 壹

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民族性 壹

## 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

沙莲香 主编

自尊自谦

贪婪

不紧张

因循守旧

无为

平和

贞节 勤俭

圆滑

奴性

面子

公私混杂

家本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性 (一): 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沙莲香主编.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0-14858-8

I. ①中… II. ①沙… III. ①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4797 号

## 中国民族性 (一)

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

最新版

沙莲香 主编

Zhongguo Minzuxing (1)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张 28.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8 000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序

《中国民族性》(一)、《中国民族性》(二)两本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0年后,《中国民族性》两书及《中国人百年》一书,先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外版。

“中国民族性”研究作为“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得到了该基金的资金支持。在其支持下,我们广泛收集资料,进行问卷调查。《中国民族性》(一)的资料收集是由当时任教的于硕完成的。她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重要图书馆和资料室,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将收集到的论著复印、装订成册,并将论著摘要编辑成册,这些论著是《中国民族性》成书的基础。这个工作的完成是极其辛苦的。后来,我们对论著摘要进行了分类编辑,形成类似“关键词”一样的“条目”。这项工作主要由当时在读的86级研究生许风海、袁方、唐顺义承担,他们有时跑到北京图书馆利用那里的空间进行卡片分类和编排,也十分辛苦。一晃20余年,他们都已成知识界的有为之才。

《中国民族性》(二)的调查、调查结果数据统计分析和讨论,是由当时87级在读的研究生苗少波、彭泗清、罗新、操鸣婵直接操作完成的,彭泗清和苗少波还参与了该书的写作。一晃20余年,他们亦成为知识界的有为之才。

《中国民族性》从第一本到第三本写作完成,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从时间上看,这个过程与改革开放的30年大致同步。从《中国民族性》(一)所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出,资料有限,书中除了费孝通和张岱年前辈的东西是现成的出版物,其余珍贵的论说大多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图书室复印过来的,另有一部分得助于日本学者。这种资料比较贫乏的境况,成了思考上和设计上的一种限制,当时已在海内外学界称雄的杨国枢有关中国人本土化研究的著作竟然找不到。这次再版,我们对《中国民族性》(一)尽可能做了补充。关于民族性变迁的写作,从2005年启动之

后，我有数年的迟疑，对民族性的实际表现感到不少的“怅然若失”。2008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人性观照”和“公共精神”，表现出了我们这个民族久违的人文关怀。写“变迁”是写已经发生了的现象，这是奠定写作真实感所不能没有的基础。

中国民族性的研究重点不是研究中国人身上究竟存有哪些性格特质。性格特质在现实的形态下有很多很多，并且一些特质是为人类所共有的，这样，不同人种或民族的族群之间才有可能既相区别又相关联，才有可能比较和联络。不同的族群，性格特质的结构形态不同，因而有些特质在有的族群更突出、更普遍、更深刻地起作用。同时，这种不同还表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人的要求和提倡上，不同的民族，价值取向不同，民族性格特质在其根源上由文化规定。但也可以逆过来说，文化是民族的性格规定，中国文化是对华夏民族特点的接纳和提取。因此，不同人种或民族对不同特质所给予的认同、伸张以及维护的自觉意识是有所不同的。20年前出版的《中国民族性》（二）建基于《中国民族性》（一）归纳的中外不同看法所做的问卷调查，但是，问卷设计和调查结果数据的统计分析都集中在性格特质的结构特点上，即一种“双重结构”或“多重结构”，亦即不同“情境”下，不同的特质起突出作用。这个调查和研究的直接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中“不讲真话”。《中国民族性》（三）的写作重点不是具体写作30年里哪些性格特质有变化，而是在《中国民族性》（二）的基础上，沿着“中庸”在民族性结构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分析中国民族性变迁所牵动的“中庸之变”与少数人才的必然出现，以及我们应当寄予的期待——创新历来出自少数，这就是《中国民族性》（三）写作中对“中庸”的“另解”观念。

《中国民族性》这一系列放在某种视域中就是一种记载。这个记载的一个侧面是，民族性变迁是由无数个体的变化而组成的无尽的变动。因此，写民族性变迁就会写到一些个人，也会写到自己——自己对经历的体证、自己的观念和认知、自己对所属文化和所属时代的承担。大概，这是一种难免之事。

这个记载的另一个侧面是，民族性变迁沿着集体行动者的演绎轨道而表现得多姿多彩，但贯穿其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是劳动者的力量，即农

民、工人、企业职员和管理者、教师、医生、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传媒人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角色担当，有不同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而志愿者是近年登场的社会力量。由这个侧面看，写民族性变迁就是写集体行动者，写不同生活条件下的“人相与”及其后果。

沙莲香

北京万寿园

2011年12月

## 繁体字本序

去年9月悉香港三联书店姚永康先生函，得知拙作《中国民族性》（一）、《中国民族性》（二）两书拟在香港出版繁体字本。一时思绪涌起。对于香港三联的出版设想，感到荣幸，而就两书本身又感到不如意。两书差不多是十年前出的，若从着手收集资料和梳理研究思路、设定理论支撑点等一套预备性作业算起，就更早了，大约是1982—1984年的事。那个时候国门刚开，我东渡扶桑。东渡之前，还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荡体验。“文革”结束，人如噩梦初醒，希望搞社会心理学，研究人。这前前后后至少二十年，占去当时生命历程的小半。此前，一直是校门出一校门进的书生。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科研修两年，又是一种宿舍、图书馆和南博心理学研究所三角路线，极少旅行，有了机会也多是让给伙伴，自己安于和享受“三角地”生活，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教授称我“书虫”。在那两年里，还经常同在日本研修的学者交谈和探究中国人问题。

海外研修的人，怎么会那么热衷于中国人问题的探讨呢？回头看去，是由于十年甚至更长些历史年代的民族鳞伤，在实际上成了对我们的质疑和呼唤。而“文化大革命”所伤害和毁坏的珍贵之物正是人和人的精神。人有情，人亦老，当为自然而然的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该是反其自然。因此，“文化大革命”首先唤起的就不能不是对人的关切。

把耳闻目睹的事象转换为“问题”给予研究，还需要理性和被理性凝成的理论，才能揭示“问题”之本质。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扩大理论视野、不断深入的过程；加之当时所能收集的资料有限，两书出版数年之后，就想修订，结果，还是未能做到。后来，着手《外国人看中国人100年——怎样看人看我》和《中国人100年——人格力量之有》的写作，以期对《中国民族性》（一）、《中国民族性》（二）作些补救。

香港三联书店要出海外繁体字本，这给了我们一个修改的良机。姚永康先生同我磋商再三，我们仍无余力令三联如愿。这是很感遗憾的事。繁

体字本出版，只能对《中国民族性》（一）中某些论著年代顺序的编辑之误做更改，另外补充毛泽东有关中国人的论述。毛泽东的论述选自己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个编辑工作是由我的在职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潘宇先生完成的。她很忙，要感谢她的相助。在此，也对姚永康先生及三联书店表示感谢。

沙莲香

1999年2月

## 代序：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

戴 逸

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以及他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包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我。这种方式与能力，各民族、各时代的情况很不相同。古代人改造世界的方式与能力跟现代人大不一样，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的方式与能力也不一样。这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所决定的。客观环境对人类提出挑战，人类怎么对付它，或者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各时代、各民族的行动的目标、方法、知识水平、价值标准、生活态度、心理状态、世界观都不同，这些构成文化的因素就决定了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与能力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不同。

文化作为人类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有的是有形的，有具体的事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如上古时代的石器代表一种文化，陶器也代表一种文化，现代的工厂、铁路、轮船、飞机等具体事物代表工业时代的文化。这些具体事物反映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物化。如果离开了精神创造，那么具体事物就失去了文化意义，就不成为文化，只是一堆僵死的物质的外壳。在这里，物质与精神相互联系，精神的创造、人类的智慧通过具体事物表现出来。人类的科学技术通过工业产品表现出成果，人类的艺术通过艺术品来表现，如一幅画、一座雕像。物质必须凝结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创造才能取得文化意义。自然资源不具备这一条件，所以它不是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成果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像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道德规范，都不表现为具体事物，但也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甚至于更深一层完全属于精神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审美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也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

总之，广义文化既是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又是改造世界的成果；既表现为有形的物质的载体，又表现为精神和内在的心态。这样说来，四面八方，里里外外，文化无所不包。文化包含的内容这么宽广，怎样来进行研究呢？研究什么呢？

文化是个复合体，包括许多部门、许多学科，它的研究必然涉及许多部门、许多学科。文化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民俗学都有关，文化渗透到各个领域。但我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不是去研究文化系统中包含的各个具体的部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体由许多要素、部门综合构成，所有这些具体的要素、部门综合在一起，有机构成文化实体，或者说，有机构成文化这个大系统。但是，文化实体本身并不简单地等于许多具体要素相加的和。当许多部门、要素相互联系，综合形成一个文化体系时，这个体系本身又具有新的质态，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有它整体性的特点，这种整体性的特点并不表现在各要素的相加。整体包括部分，但整体并不简单地等于部分之和。所以，中国文化并不是把中国的科技、文学、哲学、艺术、历史这些部门加起来，不能这样简单地等同，这样简单地相加不能把握文化的整体性。现在我们研究文化、讨论文化当然要涉及许多具体部门，但探索具体部门的规律性，不是文化研究的任务，这应由具体部门的研究人员来解决。文化研究的任务是把握文化体系整体性的特点，作综合性的考察。

文化研究的对象首先是文化的性质。一种文化系统总有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区别于其他文化。我们一般用社会发展形态来区分文化的性质，也就是说，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来决定文化的性质，表现文化的时代性。文化具有时代性，不同生产方式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不同性质的文化是不能混同的。一般说来，后来者居上，愈是后来的文化，愈是先进，因为后来的文化吸收、综合了以前的文化，加以新的创造、新的发展。当然，一种较高的文化，刚刚处在新的阶段时，处在幼稚阶段时，不一定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还没有旧的文化那样成熟、丰满，但随实践的发展，随新文化全面的成长，必然超过旧文化。

其次，我们应研究文化的类别。文化是可以用品种方法、标准分类的。如用生产、生活方式加以分类，可以分为渔猎文化、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用地域、国家加以分类，可以分为欧美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原始时代的文化干脆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加

以分类，如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旧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文化包含的领域宽广，内容复杂。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用某种标准来加以分类，大类的下边可以分成小类别，成为亚文化。大文化体系可以分成许多小文化。像中国古代文化这个大文化系统里，就包含了许多亚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等。所以应该用各种方法、标准进行分类，在分类中加以比较，加以分析，认识各种文化的共性和特点。

文化研究还应包括对文化的功能，即文化的效用、价值之研究。前边我们说过，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动物谈不上文化，只有它的本能反应），反过来，文化又塑造了人。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文化圈子里生活、成长、受教育，取得知识，培养自己的能力，学会怎么思考问题，怎么行动，怎么适应环境，怎么改造环境。人是社会动物，是指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中，他属于某种文化。我们说中国人跟欧洲人、美洲人不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种族不同，欧美人是白种人，中国人是黄种人；另一方面是文化不同，中国人与欧美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史、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有一些华裔的美国人，从小在美国长大，如果他完全吸收美国文化，虽然在血统上是中国人，但在文化上他是美国人，他对问题的反应跟我们已经不同。所以说，文化塑造了人。

此外，谈谈文化比较研究。各种各样的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它们的优点与局限性。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各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它的根据，都有它的合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文化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衰落了、消失了。文化的比较研究很有意义，观察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的潮流，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当来潮的时候，一种文化开始生长，汹涌澎湃，很快地发展。当退潮的时候，它销声匿迹。文化的比较有高下之分，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因为文化总是从初级形态进化到高级形态。不承认高下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就等于否认文化的前进性，也否认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文化的比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高下之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优劣之分，因为文化有类型上、风格上、情调上的差别和表现手法的不同等等。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地域条件下，创造不同形态的文化。所以各种文化的差异性，不能完全用高低、优劣、先进与落后来判断。比如中国的荆楚文化、幽燕文化、巴蜀文化等一些地

区性的文化，各有特点，但不能说哪种文化优越、哪种落后。去年（按：指1986年）上海提出“海派文化”，当然有它优越的方面，但不能说它比其他文化先进，它同样存在局限性，不能绝对地用先进与落后来区分这种地区性文化。即使人类早期的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处在初级阶段，当然比现在的文化落后；但在某些方面，它达到的成就，是现今先进文化不能比较的，赶不上的。像希腊文化，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文化，但希腊文化的许多成果，恐怕我们今天也创造不出来。文化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对各种文化加以鉴别，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认识它们的丰富多彩，认识它们的价值，认识它们在人类发展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大问题。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我们在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即它产生于什么样的环境，是怎样发展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有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首先，中国是农业社会，6 000年以前，中国就种植农业作物。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散漫的一面。

其次，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有2 000多年的历史。专制主义、官僚结构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再次，中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人们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中国文化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形成的。

最后，地理环境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中国位于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 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跟其他文化发达地区隔得比较远，交流比较少（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交流，如丝绸之路，但这种交流比较少）。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但它有个主干、核心，这就是儒家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当然，儒家文化本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百家争鸣”，儒家只不过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汉代，董仲舒发挥了儒家学说，使其成为统一的专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

态，成为官方文化。汉代儒家已然不同于先前的儒家了。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儒家也有变化，它吸收了佛学。到宋代，产生了程朱理学、新儒学。儒家文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变化过程，也吸收、融汇了其他文化，很明显地吸收了道家、法家、佛教思想，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所以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冲突、融合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大规模的接触、交流有三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从东汉起，历经几百年：开始是比较粗浅的佛教教义的传播。中间经过长期的消化、文化的整合，到唐代，发展到高峰，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到宋代，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佛教的传入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发生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从利马窦到汤若望、南怀仁，从明末到康熙年间，100多年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好几百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1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译著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科学仪器也很多。但雍正、乾隆年间，这种交流中断了。原因很复杂，当时中国对西方缺乏认识，所以没有形成一种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的潮流。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文化的冲突，也是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吸收、交流、冲突，到现在还没结束。当然，现在封闭的局面已经打破了，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那样的闭关状态。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人际关系。

在中国，伦理道德、历史学这一类科学比较发达，而不太着重于对自然的研究，不着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中国自然科学相对来说不发达。

中国编《四库全书》时（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盛时，也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总结时期），法国像狄德罗、卢梭等百科全书派正在编《百科全书》。通过这两部书的比较就可看出东、西方知识结构的差异，也可看出东、西方文化性质、价值观念的不同。当然古人对自然科学也不是漠不关心，但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纯客观的对象，排除主观性去研究

它；而是用“天人合一”的观点，用主观的思想感情、主观的意象赋予自然界以种种意义。中国的诗文里讲自然的很多，都是以自然界为题材，但是这只是叙述，而不是用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它；是欣赏它的美，而不是追求它的真。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比较着重于人际关系，有人称之为人文主义、重视人，但我认为人文主义是西方的思潮，有它特定的内容，恐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不是一回事。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不是肯定个人价值，而是肯定个人对其他人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重视人的历史使命，它讲人与社会、与别人的关系，强调人要有社会、为别人作出贡献。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忽视了人本身的权利，把人的价值过分地放在与别人的关系上，而不在自己本身。它讲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等，都是在讲人和别人应处在一种什么关系中，但是这个社会给人以什么保障呢？它忽略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同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2 000 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而且深深渗透到国民性中，它同官方结合得非常紧密，是官方哲学。“学而优则仕”，其治学目的就是做官、入世。儒家有它积极的方面，即它是入世的哲学，不像佛教。儒家重视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儒家有许多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它强调要治天下，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它密切结合政治也产生了另外一种缺陷，即依附于政治，经常以官方标准做判断，把很多事情都附会到政治上去，甚至彗星出现、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现象都成了被附会的对象，成为天人感应的一种现象。它认为政治上有失误，上天就要“示警”。另外，缺少自由的创作，凡是不合于官方口味的，都被称为异端思想，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迫害屡见不鲜，文字狱历代都有，政治干预文化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中国文化第三个特点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法家族色彩。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统一的宗教，没有那样大的教权（西方的教皇在中世纪甚至比国王地位都高）；但是族权——宗族的权力、家族的权力很发达，它实际上控制着老百姓。老百姓把两个东西看得最重要：一个是真命天子——皇权，一个是老祖宗——族权。皇权跟族权的势力渗透到各个方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君”和“父”是中国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也就是说，人和动物最

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君”和“父”。与“君”和“父”相应的，就是中国道德观念规范中的“忠”、“孝”。忠臣、孝子是最完美的人格。所以宗法家族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在国民性格中也是很重要的。这还可以从中国古人两个重要的生活目的——（1）光宗耀祖，（2）传宗接代看出来。

光宗耀祖。人活着是为了使他的家族光彩，个人奋斗、读书应举、做官发财，固然是为自己享受，但他更大的目的却是光宗耀祖，给家里立个牌坊或挂一块匾，或者给家里修坟扫墓。

传宗接代。就是生儿子，把家族绵延下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家族的延续和家族的昌盛。

上面提到的“孝”，我想也应该分析。它当然有好的方面，即它是对父母的正当感情、正当态度，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理应如此。但是如果把这种感情态度提升为道德原则，并且加以绝对化，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流弊。中国古人心中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死亡，甚至不是国家的灭亡，而是宗族的灭亡，灭族之灾是最大的不幸。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它是一个悲剧，讲的是封建大家族的没落。

下边，我再谈一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似乎比较注重直观、着重于体验，相对来说在推理分析上比较薄弱。中国人思维方法的特点是先直觉到某一个真理，然后用比喻或类比等方法来表现这个真理；用例证的方法来加强、说明这个真理；缺少从未知推到已知的过程（并不是没有，但这方面比较薄弱）。

我们读中国思想家的书，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往往感到有深刻的哲理。但是其思想是跳跃式的，在他们的体会中想象的色彩比较多，比较凝厚和强烈，所以它有许多精彩的片断，有许多闪光的颗粒，但是不连贯，缺乏多方面的论证。中国古代圣贤喜欢用格言方式来表达思想，这些格言没有展开，没有充足的论证，比如《论语》，它的道理就几句话或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有一句话。这个《论语》就是语录式的。老子的《道德经》也是非常简练的。宋明理学家许多理论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在一两句话中讲一个生活的道理，简短有力，把真理浓缩在片段中。这同西方著作不太一样，西方的著作都是大部头，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很繁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中国的艺术也有其特点——强调写意，而不是写真。现代的中国画采

用了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段；古典的中国画中的人很小、很远，画在山水风景中间，强调的是人跟景的交融，人在景中，不是强调人的面目。“传神之笔”要传神，不像西方油画那样写实、写真。油画创作很真实，简直像照片一样，它讲究比例、线条、透视、色彩等，画人要画模特儿，要讲骨骼肌肉。国画不讲求这些，画人的比例也不大对，脸大身子瘦。中国的戏曲好像也有这种情况，也是表现神似，只求意思到了，而不是把真实的细节、生活中的真实都全盘托出。

中国人表达感情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是无保留地表现。文化人与野蛮人是有区别的，他不能毫无节制地发泄感情。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内心世界设置一层帷幕或纱巾，或厚或薄，挡住内心世界。中国文化设置了较厚的帷幕。人类的喜怒哀乐本是自发的、本能的，如果毫无节制地让它泛滥，就势必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文化集中在人际关系，因此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按一定规范、程式办事。所以中国人表现感情没有采取像西方的接吻这一类的方式，而是用打躬作揖，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几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儒家的中庸。关于中庸，已经有许多文章写过了。中庸这一概念承认对立面的矛盾、统一，但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矛盾的缓和、调和，更高地强调了事物统一性的方面，保持一种和谐。中庸之道是不走极端，防止矛盾的激化。要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第二个概念是礼义。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对个人来讲，就是“克己复礼”，约束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不然就会相冲突。“礼”是调解人和人关系的准则，也是工具，“克己复礼”既是理性的克制、自觉的克制，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克制。人必须按礼义来办事，把自己约束在一个人际关系规范里，礼义不仅约束个人，也约束国家、家庭，于是有了“礼义之邦”、“礼义之家”等。中国人向来强调礼义，不重视法，礼义和法是相对的。“礼”带有更多的自觉性，带有更多的教育的性质，“礼教”形成一种“讲礼”的风气。而法更多的是强制，中国古代强调了“礼制”，而不强调法制。中国的法也有，而且在古代还很发达，但中国的法也有特点，即它似乎是专用来惩罚人的。一提法家就让人想起严厉、刻薄和无情无义来。所以，中国古代的刑法特别发达，民法不发达。法对那些破坏社会制度、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者惩治性很强；而那些财产纠纷、婚姻纠纷等老百姓日常间的冲突

却不是付诸法律，而是由家族来处理，不惊官动府。由此可见，古代法规打击什么是很明确的，但它保护什么（老百姓的正当利益等理应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就不明确了。归结为一句，就是法制不健全。还有就是“义利”的观念，重义轻利，强调道德修养，强调主体性的自我完善，而不着重于物质利益。《孟子》开章（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话：“王曰：‘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话是很正常的，但孟子却当头一棒，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而已矣。”然后是对梁惠王的教训，最后他的结论是：“天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把利和义对立起来，重义轻利。儒家文化追求的是自我的道德完善，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减其乐”，这是孔夫子对他的道德修养的称赞。轻利重义，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种思想培养了许多为正义、为民族大业而奋斗的有高尚人格的人。他们不重视个人享受，讲究气节，讲究人格，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向权势低头。所以，在儒家所强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熏陶下，产生了一些英雄人物。但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轻视商人，轻视商业，过分地、绝对地强调人的道德完善、道德修养，其结果就是使人的正常的要求权利受到压抑，到宋元时就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欲望被消灭了。走到极端时，这种道德就变成对人的摧残。

以上是我对中国文化的粗浅感受。下面简单谈谈对本书的一些看法：

100多年以来，中外学者、著名人士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及文化做了大量研究、记述，有的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有的见解肤浅、失之偏颇。但总的来看，这些论述在中国以及世界不少国家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愤愤然者也不在少数。此书通过对这些论述的大量筛选，挑选了有代表性的各种人物的各种观点，汇编成册，以供国人研究参考。相信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的当代学者自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我也寄希望于《中国民族性》（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答案。

1987年